

## 《藏紀概》成書背景與文獻價值

柳 森

**內容提要：**清人李鳳彩所撰的《藏紀概》在西藏方志編纂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學界的關注並不多。本文在充分挖掘相關史料的基礎上，對《藏紀概》的成書背景與文獻價值進行了系統論述。

**關鍵詞：**藏紀概 成書背景 文獻價值

清人李鳳彩所撰的《藏紀概》，我國著名的民族史學家吳豐培先生頗有研究，並給予以下評價：“迄乎清代，入藏者夥，始有方志紀程之作，然大都成書於雍乾以後……此書之成，遠在雍正五年以前，較早之作，更足珍視，故列於藏地志乘之首，以為藏志最早之本。”<sup>①</sup>由此，《藏紀概》在西藏方志史上的重要地位可見一斑。《藏紀概》也具有極其重要的文獻價值。該書中的相關文字記載，可與（雍正）《四川通志·西域》、（乾隆）《雅州府志·西域》、《西藏志》及《衛藏通志》等進行校勘、比對，以追溯相關史料的來源與可信性。另外，該書在編纂體例尤其是篇目設置方面的相關創新，更為之後清代西藏方志的編纂工作提供了重要借鑒。因學界對《藏紀概》的關注較少<sup>②</sup>，故筆者就該書的成書背景與文獻價值展開論述。

### 一、《藏紀概》的成書背景

關於《藏紀概》的成書時間，除上述吳豐培先生認為是清雍正五年（1727）之前的觀點外<sup>③</sup>，趙心愚先生認為，“從目前的研究來看，成書時間明確早於《雅州府志》的藏志著作僅有《藏紀概》書……《雅州府志》成書時間要晚於《藏紀概》十多年”<sup>④</sup>，因《雅州府志》成書於乾隆四年（1739），則其認為《藏紀概》成書於雍正七年（1729）之前。此外，《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將是書的成書時間定為“清雍正間”<sup>⑤</sup>。此外，還可結合書中所載史事推測成書的時間下限，書中述及康熙五十九年（1720）清中央政府派兵入藏平定準噶爾擾藏之事，而“卷之初”便錄康熙六十年（1721）“聖祖仁皇帝御製論地理水源文”，“文”中還提及康熙六十年二月初四日撫遠大將軍允禔的奏摺。另，國家圖書館藏的民國二十六年（1937）國立北平圖書館抄本中，卷首有清人唐肇所撰的《藏紀概敘》。此敘落款為：“時雍正五年夏至前，唐肇撰。”<sup>⑥</sup>綜上，筆者認為《藏紀概》的成書時間可定康熙六十年至雍正五年之間。基於此，結合當時的社會歷史沿革，可知其成書背景為：

（一）清中央政府對西藏地方控制力不斷強化

《藏紀概》全文共一萬餘字，分三卷，“卷之初”抄錄邸抄所載的聖祖仁皇帝御製論地理水源文，並記作者所在部隊由青海西寧進入西藏拉薩的行軍過程；“卷之次”記四川、雲南兩地入藏程途；“卷之尾”記西藏的天文、地理、人種、民俗等。其中，有關由西寧、四川、雲南等地進入西藏的路程方面的內容，尤其是行軍路程方面的內容在文中佔有較大比例，而有關西藏經濟、文化、風俗等方面內容所佔的比例則明顯偏小。由此觀之，作者尤為重視與西藏相關的軍事、政治方面的情況，而此書內容分配原則必然與其時的形勢發展相關。可以說，《藏紀概》是清中央政府平定藏亂、對西藏地方控制力不斷強化的產物。

18世紀初期，在清中央政府統治者政治視野裏，西藏地方處於重要地位。其對西藏地方的治理力度也不斷強化，同時，西藏地方的政教格局也正處於頻繁調整期，而《藏紀概》正是產生於這一歷史背景之下。

首先，清中央政府對西藏地方的重視程度逐步提升，對其控制力也在不斷強化。這就引導當時部分有識之士將目光投向西藏並力圖置身藏地而觀究竟，也就成為民間、私人編纂西藏志書的政策基礎。

清中央政府統治者對西藏非常重視，原因在於：在其政治視野中，關於蒙古和西藏的地位，出於歷史與地緣方面的原因，蒙古的重要性是第一位的，西藏因宗教原因而成為其撫綏蒙古各部的“第二障地”。一方面，明後期以來，隨著藏傳佛教在蒙古地區的傳播，喇嘛作為一個脫離社會生產的“特權”階層日漸形成，藏傳佛教逐漸成為蒙古各部中佔統治地位的社會意識形態，以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為代表的藏傳佛教領袖逐漸成為蒙古各部的精神領袖，而與藏傳佛教領袖建立相對牢固或親密的關係，能在很大程度上強化蒙古各部首領統治權力的合理性與穩固性。由此，蒙藏雙方因藏傳佛教而交往日盛並密不可分。另一方面，清中央政府統治者也清楚地知道，在滿族勢力自身崛起及其擊敗明軍入主中原的過程中，蒙古勢力的作用不言而喻，而蒙古王公更是清朝中央政權的重要支柱，由此，充分利用藏傳佛教在蒙古地區的影響，可以起到穩定當時中國北部邊疆的作用。對康熙帝、雍正帝的治邊政策多有傳承的乾隆帝深諳此道。其《御製雙忠祠詩》中寫道：“衛藏西南夷極邊，入我王化百餘年。始猶羈縻後執隄，置兵為守防呼韓。蒙古習俗尚黃教，得失視此為轉旋。”<sup>⑦</sup>因此，利用藏傳佛教在蒙古地區的影響，可以起到穩定當時中國北部邊疆的作用。這也正如乾隆帝所說：“蓋中外黃教，總司以此二人（按：指達賴與班禪）。各部蒙古，一心歸之。興黃教，即所以安衆蒙古，所繫非小，故不可不保護之，而非若元朝之曲庇諂敬番僧也……以為懷柔之道而已。”<sup>⑧</sup>

清朝開國不久，順治帝即遣使赴藏，敦請五世達賴到北京會晤，始定“達賴喇嘛”封號，並為其在北京駐錫和禮佛修了“黃寺”。同時，晚年佛教信仰傾向愈加明顯的康熙帝、雍正帝，均對西藏及藏傳佛教重視有加。康熙五十二年（1713），康熙帝下旨，冊封五世班禪洛桑益西為“班禪額爾得尼”。據《清實錄》載：“論理藩院：‘班禪呼圖克圖，為人安靜，熟諳經典，勤修貢職，初終不倦，甚屬可嘉。著照封達賴喇嘛之例，給以印、冊，封為班禪額爾得尼。’”<sup>⑨</sup>此舉是從防止“一極獨大”的目的出發，通過提高班禪系統在西藏社會的政治地位，以制衡達賴喇嘛的勢力，牽制西藏上層世俗貴

族，進而保持西藏地區政局穩定。由此，清中央政府對西藏地方的重視程度便逐步提升。

值得注意的是，本書作者李鳳彩本人也對清中央政府對藏傳佛教的重視有所體會，而這也體現了其自身對以喇嘛為代表的藏文化的一定程度的認知與興趣。其在《藏紀概·原由》中寫道：“明嗣，京師立有番經廠，暨本朝主臨天下，撫有萬邦，西僧之名號‘喇嘛’，擇其道行高者，廩結居於京城旃檀白塔寺，以攝察諸喇嘛。自黑龍江鎮南抵廣東澳門，沿邊諸口俱不禁阻。喇嘛中掌教壇修持者，代奉一人，成為活佛，居藏中，數十年來，貢使不絕。”<sup>⑧</sup>以上這種認識與興趣，也為其編纂《藏紀概》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其次，其時，西藏地方的政教格局也正處於頻繁調整期。具體表現為，西藏地方的政治權力受到蒙古準噶爾部勢力的操控，這無疑是不利於清中央政府的邊疆治理進程的。

明末清初，厄魯特蒙古四部之一的準噶爾部迅速崛起。康熙十二年（1673），準噶爾部發生內亂，在西藏學佛的噶爾丹自立為汗。不久，他吞併了厄魯特諸部落，佔據南疆，其在對抗清中央政府的同時，還覬覦西藏地方的統治權。為此，康熙帝三次御駕親征，終於康熙三十六年（1697）擊敗噶爾丹。

康熙五十六年（1717），準噶爾部首領策妄阿拉布坦再次發動叛亂，其派遣台吉策零敦多布，出兵6000，穿越戈壁、雪山，突襲拉薩，並大肆摧毀佛教。他還任命原與拉藏汗不和的達孜巴為“第巴”，管理西藏政務，成為準噶爾部在西藏地方的代理人。對此，原屬拉藏汗的官員在康濟鼐、頗羅鼐的領導下，自西藏西部的阿里、日喀則一線向拉薩進攻，另一名官員阿爾布巴，也在拉薩以東的工布地區起兵，分別打擊準噶爾軍。

清中央政府為維護祖國統一、恢復西藏地方政局穩定，於康熙五十九年再次用兵西藏，任命皇十四子允禵坐鎮西寧，派將軍延信統帥各軍，配合頗羅鼐、阿爾布巴等部內外夾擊，結果重創準噶爾軍。同時，將居住在西寧塔爾寺的達賴喇嘛“呼畢勒罕”格桑嘉措冊封為第七世達賴喇嘛，並賜金冊、金印，由青海蒙古王公等隨清軍護送入藏，於是年九月在布達拉宮舉行隆重的坐牀典禮，此舉受到蒙藏僧俗人眾的熱烈擁護。此後，清中央政府嚴辭拒絕了羅布藏丹津提出的恢復和碩特部在藏權力的無理要求，從而徹底結束了蒙古和碩特部對西藏地方長達70餘年的統治。清中央政府還下令廢除了獨攬藏政大權的第巴職務，建立了僧俗貴族掌政的四噶倫制，任命康濟鼐為首席噶倫，阿爾布巴、隆布鼐、扎爾鼐為噶倫，旨在通過他們四人聯合掌政，更好地貫徹清中央政府管理西藏地方的政策措施。不料，雍正元年（1723），羅布藏丹津又發動了叛亂。次年，清中央政府出兵平定了叛亂。雍正四年（1726），清中央政府議准設立駐藏大臣二人。之後又於雍正五年正月，正式派遣僧格、瑪拉為駐藏大臣，並設立了駐藏大臣衙門。由此，西藏地方的政教格局趨於穩定，而清中央政府對西藏地方的主權管理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藏紀概》作者李鳳彩就是康熙五十九年奉命入藏打擊準噶爾部亂藏的清軍陣營中的一員。其時，“彩，書生從戎，以山東額外守備領標兵，隸總兵李公（按：山東總兵

李麟)，參幕中事”<sup>⑩</sup>。因此，其對當時清中央政府治藏政策的執行與調整過程，以及西藏地方政教格局的動盪之勢，必然有直觀感受。

## （二）李鳳彩的個人努力

早期西藏方志，絕大多數為私人編纂。這不同於中原地區的方志均為政府組織修纂即“官督紳辦”的情形。這種情況的出現，與清中央政府奉行的“因俗而治”的治邊策略密切相關。但是，隨著清中央政府對西藏地方的關注程度與治理力度的不斷提升，加之官兵、商賈、學者等人藏頻率不斷增加及其相關見聞的不斷傳播，對異文化較為敏感的中原地區的知識分子，必然會對西藏、藏族文化產生一定程度的認知興趣。因此，作者李鳳彩的個人興趣與相關努力，也是纂成《藏紀概》一書的重要背景因素。

首先，李鳳彩畢竟是受儒文化熏陶的知識分子，其在知識儲備與使用方面，受到儒家“經世致用”思想的影響較大。其本人在敘述編纂《藏紀概》的原由時自言：“中外悉歸，皇輿、紀載宜補未備。”<sup>⑪</sup>因此他在從軍入藏之際，便着力收集相關史料，以期成書後，為朝廷治國所用。康熙五十九年，清中央政府第二次派兵前往西藏以打擊準噶爾部亂藏勢力，李鳳彩遂主動請纓，投筆從戎，隨軍由青海西寧直抵西藏拉薩，不僅在解決軍隊糧草補給方面提出了合理化建議並被採納，還積極留心訪問並記錄沿途及拉薩當地自然狀況與文化、民俗等情況。可以說，正是其個人的“有心而為”，成就了這部目前可見的西藏方志的開山之作。

其次，李鳳彩心思細膩、注意觀察訪問。他通過實地考察，收集了大量一手資料，為其編纂工作提供了堅實的材料儲備。對此，時人唐肇受邀作序時曾言及：“修江李公讀書饒志節，成孝廉後，即遇朝廷用師，固請纓效力行間，身歷艱險凍餒，佐軍門，建練兵裕糧之上計，遂直抵烏斯藏，驅賊安良。立功邀敘，授職專城，肇共相談論，聽其感仗天威，恪宣軍令，駐招六閱月，咨訪老練，記注殊異，於彼中所謂天象、地勢、人類、物事，點墨收之，奚囊若干條，俾編輯之。”<sup>⑫</sup>同時，友人奎峰主人也對自號“鐵船”的李鳳彩評價道：“鐵船本孝廉，效力行間，進履其地，不但降彝安藏，功績居多，而且留心風土，採訪番情，供緯創之考稽。”<sup>⑬</sup>所以，《藏紀概》的編纂完成，也正反映了以下事實：其時諸如李鳳彩等少數中原地區知識分子對西藏地方的認知興趣不斷高漲，同時，其認知水準也隨著親歷實地調查而逐步提高。

## 二、《藏紀概》的文獻價值

### （一）《藏紀概》為後世開創了西藏方志編纂的新模式

第一，作者在篇目設置方面獨樹一幟。其結合西藏地方實際，創立了獨具西藏地方文化特色的篇目名稱。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天異”、“土則”、“附國”、“招跡”等篇目名稱。這在同時期及此後的中原地區方志中是難得一見的。具體來講，“天異”主要敘述的是西藏地方的天文與氣候狀況，“土則”重點記述拉薩地區的疆域、城郭、山水、田地、村落等情況，“附國”則着重記載“後套”、“後藏”、拉薩以西及以北地區的自然情況。

第二，該書開創了“程站”記載模式。這種有關入藏程途、路線的篇目及編寫模

式，被之後所成的西藏方志如《西藏志》、《衛藏通志》、《西藏記》、《西藏志考》等廣泛效仿和沿襲，也為從交通角度記錄和研究漢藏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參考。

第三，是書編纂視野宏闊。文中不僅主要介紹了西藏地方的山川、地理、疆域、津梁、交通及關隘等基本情況，也涉及西藏地方的民族、宗教、僧侶、寺廟、衣冠、飲食、宴會、生育、占卜、醫藥、喪葬、商業、娼妓、婚嫁、禮儀等諸多方面內容。值得注意的是，關於民俗文化，作者的着眼點在於記錄並比較藏文化與中原地區漢文化的不同之處。這也為後世留下了有關藏族與西藏地方的特殊文化特點的珍貴記載。而這一內容多元的編纂模式，也為後世纂修西藏方志者所繼承和發揚。

(二)《藏紀概》的新創篇目名稱與相關文字記載，為(雍正)《四川通志·西域》與(乾隆)《雅州府志·西域》所借鑒

首先，(雍正)《四川通志·西域》纂修於雍正十一年(1733)，於乾隆元年(1736)刊行。該通志的卷二十為“西域”，此處所謂“西域”乃沿古代稱謂，在該志中實指廣大藏區。是書對《藏紀概》新創的篇目名稱及其內容，進行了大膽的借鑒，具體情況如表1：

表1

《藏紀概》		(雍正)《四川通志·西域》	
藏天異	日月明晦，雷電震作，較中華無異。(少)晴霽，多雨多霏，微少滂沛。夜不見露。秋季終有薄雪，不厚積。秋末春初俱有薄雪冰雹，平時稀見。	天異	日月明晦，雷電震作，較中華無異。少晴霽，多陰雨，夜亦有露，秋終有薄霜。
藏土則	烏斯藏地田有水旱，土地平衍。現在活佛及藏王所都：活佛立床之處為布達拉，藏王所居為招。南北袤長將四十里，東西延廣四五百里。陸可馳馬，中間包貫於河，水流東去，亦駛急。清波漣漪，澄澈見底。招內夾河兩聚落皆臨河岸，並無城郭，就聚落居人。所住碉樓相聯，以為捍禦。似中華一大村鎮。崇山圍繞，隘口險峻，誠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固。	土則	烏斯藏田有水旱，土地平衍。現在活佛及藏王所都：活佛之立床處為布達拉，藏王所居為詔。南北袤長將四十里，東西延廣四五百里。陸可馳馬，中貫河道。水流東南，不甚快急。清波漣漪，澄澈見底。招內夾河兩聚落皆臨白水江，為藏地之中央，番夷僧俗，商賈雜處，其地廣二里許。詔中樓殿衙署，街道馬市，井井可觀。四周無城郭，就居人所住，碉樓環繞，相聯以為藩籬，似中華一大村鎮。其餘村莊星羅棋佈。外則崇山圍繞，隘口險峻，誠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勢。
西藏種類	農，遇春和水至，耕耘鋤耨水田旱地，各乘時力作。較中華農事不大殊異。只牛微小，有牛五隻作一具者。工，各色皆有。匠作丹青，累絲尤屬巧異。木石匠亦玲瓏奇巧。	人事	農，遇春和水至，耕耘鋤耨。水田旱地，各乘時力作……工匠各色皆有。木石工玲瓏細膩，丹青，累絲尤屬奇巧。

其次，清曹掄彬修纂的(乾隆)《雅州府志·西域》，成書於乾隆四年。該志卷十

二為“西域”，文字記載亦圍繞藏區展開，該書也對《藏紀概》的相關篇目與內容做了大範圍的借鑒。其中，通過仔細比較相關記載可知，（乾隆）《雅州府志·西域》中的“天異”、“土則”、“附國”等三篇目的名稱與內容，幾乎與《藏紀概》的相關篇目及文字記載完全相同。此外，前者雖然做了一些文字方面的改動或刪減，但依然可以很直觀地看出是以後者為直接性資料來源的。具體情況如表2：

表2

	《藏紀概》		（乾隆）《雅州府志·西域》
天異	自木魯烏素水西一路至烏斯藏招內，每夜日落見星即瞭望守更，日出方休。仰觀天上各星，分經大星更覺光芒閃爍，雖小星亦似光大，歷春夏秋冬四季，並不見北斗七星，此天文之殊也。	天異	自木魯烏蘇水西一路至烏斯藏招內，每於日落見星仰觀，經星及象星覺光芒閃爍，較中土為更大，歷夏秋冬三季，並不見北斗七星，此天文之殊也。
藏土則	烏斯藏地田有水旱，土地平衍。現在活佛及藏王所都：活佛立床之處為布達拉，藏王所居為招。南北袤長將四十里，東西延廣四五百里。	土則	烏斯藏田有水旱，土地平衍。活佛及藏王所都：活佛立床處為布達拉，藏王所居為招。南北袤長四十里，東西延廣四百五里。
附國	後套在大招西邊，相距五百里餘，屬藏王管轄，土產棗，土宜美饒。後藏在招之南，將千里入雲南近，亦奉活佛，土宜美饒。招中河布打里，北岸有山，名哈打里，舊為達賴喇嘛居處，山有浮圖，座旁有小河，水亦清……	附國	後套在大招西邊，相距五百里餘，屬藏王管轄，土產棗，土宜美饒。後藏在招之南，將千里入雲南近，亦奉活佛，土宜美饒。招中河布打里，北岸有山，名哈打里，舊為達賴喇嘛居處，山有浮圖，有小河，水亦清…… 康吉奈所住國在藏之西南，兵甚強，歸服本朝，亦奉活佛。

### （三）《藏紀概》的相關記載可以作為重要的參考資料

因書中絕大部分內容來源於作者李鳳彩的親身經歷和尋訪所得，因此，該書所載的諸多史事尤其是有關當時西藏地方政教格局發展變化的記載，其可信度較高，可作為相關研究的第一手資料。對此，吳豐培先生已指出：“首卷附平藏之事，當時進兵情形，均身歷目擊之談，尤可據為信史也。”<sup>⑤</sup>

首先，“卷之初”中的“清軍由西寧入藏的行軍征程”，對清軍行軍入藏路途中所經歷的諸如糧草短缺等困難及其相應的決策過程記載得十分明晰。如“（康熙五十九年）時六月二十日，越數日，各路大兵到齊，在路經行兩月風雪、瘴癘，天寒草短，馬皆疲瘠，糧運在後，住營牧馬。待至半月，糧尚未到斗米、百金，人有饑色。又數日，糧始陸續運到。然途次駝隻倒斃過半，糧亦僅存十之三四，較之原估藏糧尚不敷滿漢官兵裹帶。是時已七月中旬，兵勢倉皇，糧少馬缺，不能前進”<sup>⑥</sup>。這些第一手資料，對於後世瞭解康熙五十九年清軍由西寧進兵至拉薩、平定策零敦多布侵擾西藏一事大有裨益，同時也可補《清實錄》、《西藏志》、《衛藏通志》以及同期其他一些行軍紀程記載之不足。

其次，書中記載了清軍在進兵過程中曾遭遇慘痛失利的事實。作者寫道：“九月初

二日，渡哈喇烏素，山險河急，一望淒涼，即故將軍額倫忒戰沒處。河之南北岸，故壘猶存，白骨山積。將軍駐營，下令率兵掩埋遺骨，陰風慘澹，鬼哭神啼，見者莫不傷心。”<sup>⑦</sup>此類較為負面的文字描述在《清實錄》等官方文獻中是難覓其跡的，故可補相關史料之不足。

再次，書中有關由四川、雲南等地入藏路線的記載尤為珍貴。其中，關於川藏路線的記載與較早的《定藏紀程》、《藏程紀略》等相關記載不盡相同，而有關滇藏路線的記載與較早的《藏行紀程》也並不完全一致。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因為作者本人並未由滇藏路線入藏，因此，該部分內容應為借鑒他書之果。由此亦可推測，《藏紀概》的人藏路線記載的資料來源一定是不同於且時間早於其他相關“紀程”的文獻。

綜上，作為目前可知的成書時間最早的西藏方志，《藏紀概》不僅產生於清中央政府治藏力度不斷強化的歷史背景之下，而且在篇目設置方面具有非常突出的地域特徵與民族特色。同時，所載的絕大部分內容為作者親歷，故具有較高的文獻價值，影響也較為深遠。衆所周知，志書具有“補史之缺、參史之錯、詳史之略、續史之無”的存史價值。因此，《藏紀概》可被視為瞭解和認識 18 世紀初期西藏地方政治、軍事、文化、民俗的最為珍貴的史料之一。

#### 注釋：

- ① 吳豐培：《藏紀概·附記》，中央民族學院圖書館油印本，1978 年。
- ② 按，在何金文編著的《西藏志書述略》（吉林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出版，1985 年）中並未提及《藏紀概》。趙心愚先生在其《乾隆〈雅州府志〉中的西藏篇目及其資料來源》中，論及《乾隆〈雅州府志〉卷十二〈西域〉的篇目設置與資料來源取自《藏紀概》，具體參見《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 年第 6 期。四川師範大學 2008 年碩士論文《清代民國西藏方志研究》，第五章為《藏紀概》考述。此外，就筆者所見，尚未有他文面世。
- ③⑮ 吳豐培：《藏紀概跋》，（清）李鳳彩《藏紀概》，民國二十九年吳江吳豐培油印本。
- ④ 趙心愚：《乾隆〈雅州府志〉中的西藏篇目及其資料來源》，《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 年第 6 期。
- ⑤ 中國科學院北京天文臺主編《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中華書局，1985 年，849 頁。
- ⑥⑬（清）唐肇《藏紀概·敘》，（清）李鳳彩《藏紀概》，民國二十六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抄本。
- ⑦（清）愛新覺羅·弘曆《御製雙忠祠詩碑》，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第 70 冊《清·十》，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 年，166 頁。
- ⑧（清）愛新覺羅·弘曆《御製喇嘛說》，國家圖書館藏拓片。
- ⑨《清聖祖實錄》卷二百五十三，康熙五十二年正月戊申。
- ⑩⑫⑭（清）李鳳彩《藏紀概·原由》，《藏紀概》，民國二十九年吳江吳豐培油印本。
- ⑪⑯⑰（清）李鳳彩《藏紀概·卷之初》，民國二十九年吳江吳豐培油印本。

（作者單位：國家圖書館古籍館普通古籍組）